

形塑記憶：

漢人開發史觀點下的諸種口傳敘事及其墾殖型殖民反思ⁱ

梁廷毓ⁱⁱ

摘要

清初時期，北臺灣桃園與新竹的淺山、丘陵一帶，仍是泰雅族原住民的獵場與生活範圍。因地理位置靠近泰雅部落的傳統領域，地方上的客家、泰雅族群自清代以來，存在不少族群互動的經驗和記憶。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從官方檔案和文獻著手，進行移墾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分析，鮮少從當代族群記憶及敘事的角度，進行「漢人開發史觀」與「墾殖型殖民」(settler colonialism) 之關係的探討。本文將以筆者從 2017 至 2022 年間訪查桃園、新竹沿山地區原民部落與傳統聚落的眾多口述材料為案例，試圖區分出若干的敘事類型，並佐以相關「墾殖型殖民」之研究，反思當代北臺灣沿山地區原漢人群的記憶形塑與敘事。

關鍵詞：記憶、原漢互動、墾殖型殖民、漢人開發史

ⁱ 本文的「番」之用字與「生番」之用詞，為昔日史料與文獻慣用之文字，本文也有針對此項問題進行討論，在此並無歧視或不敬之意。

ⁱⁱ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批判與實踐研究博士班研究生。

投稿日期：2025.03.10，通過刊登：2025.08

Reconstructing Memory: Various Oral Narratives and Reflections on Settler Colon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n Chinese Developmental Historiography

Liang, Ting-Yu*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low-elevation mountainous and hilly areas of Taoyuan and Hsinchu in northern Taiwan remained hunting grounds and living territories of the Atayal people. Due to the proximity to Atayal traditional domains, there has been a long history of interethnic interaction and memory between local Hakka settlers and Atayal communities since the Qing period.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primarily relies on official archives and documents, focusing on the political-economic structures of settler society, while rarely addr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centered developmentalist historiography and settler colon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interethnic memories and narrative practices. This paper draws on a wide range of oral history materials collected by the author between 2017 and 2022 from both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nd Han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in the foothill regions of Taoyuan and Hsinchu. By identifying and analyzing various types of narrative structures, and engaging with relevant scholarship on settler colonialism, the paper reflects on how memories and narratives are shaped among contemporary Han and Indigenous

* The Ph. D. Program “Artistic Practice and Critical Research,”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populations in the intramontane regions of northern Taiwan.

Keywords : Memory, Indigenous-Han Interactions, History of Han Expansion,

Settler Colonialism

一、前言

清代統治初期，桃園、新竹一帶的淺山及丘陵地區，為北臺灣傳統意義下的「內山」¹，仍屬於泰雅族原住民的獵場與生活範圍。因地理位置靠近泰雅部落的傳統領域，地方上的客家、原住民家族自清代以來，存在不少族群互動的經驗和記憶。根據《明清史料》所載：「淡屬之烏樹林、黃泥塘二處接近內山，生番出沒堪虞」²；《淡水廳志》也載：「淡地內山，處處迫近生番」³。《劉壯肅公奏議》裡亦載：「淡屬拳山堡、大溪一帶，迫近內山，生番出沒無常」⁴。顯示清代北臺灣地區包括桃園、新竹在內的淺山地帶，皆是原住民族人生存的領域。由於「內山」的範圍，受到漢人與「熟番」的步步進逼，使得「生番」的生活空間日趨侷促，以致雙方的衝突加劇，所以內山開墾，必須靠設隘來防患「生番」的出擾。而這一段設隘防番，以隘為前鋒，向「生番」爭地的過程，便是漢人內山開發史的研究範疇。⁵

據康熙 56 年（1717）陳夢林等人編修的《諸羅縣志》所載：「凡山之綿渺阻絕，人跡不到者，統稱內山」⁶；「內山峻深幽邃，生番之所居」⁷。藍鼎元於《平臺紀略》寫下「深居內山未服教化者為生番」。⁸雍正 2 年（1724），黃叔璥的〈番俗雜記〉載：「內山生番，野性難馴，焚廬殺人，視為故常」⁹。道光 13 年（1833），

¹ 既往有關「內山」與「沿山」地區的界定和相關討論，洪麗完曾指出：「所謂『沿山地區』，籠統地說指介於平原與高山不同生態區間的地帶，不僅外來移民遷入時間、型態不同，族群關係複雜，且各地區的社會經濟型態多樣，各具區域特色」。黃卓權長期從事桃竹苗山區的文史研究，則建議將「沿山」改為「內山」；洪麗完也認為桃竹苗地區確實以「內山」一詞指稱較貼切，然無法涵蓋全臺各地情形。由於本文探討的範圍限定於北臺灣桃園、新竹地區，因此採納黃卓權與洪麗完之觀點。參見楊朝傑，〈沿山地區聚落與族群學術研討會〉，《原教界》第 31 期（2010.02），頁 93。

²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冊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員工福利委員會，1972），頁 223。

³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50-51。

⁴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14。

⁵ 黃卓權，〈從版圖之外到納入版圖：清代臺灣北部內山開墾史的族群關係〉，《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 3 卷第 3 期（2013.09），頁 164。

⁶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717），頁 6。

⁷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717），頁 36。

⁸ 藍鼎元，《平臺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63。

⁹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167。

陳盛韶所撰的《問俗錄》一書也描述：「內山生番嗜殺」¹⁰。以此來理解，「內山」係與生番「交界處」的土牛界外之地，也是所謂「輿圖定界之外」的地區。¹¹乃是人跡不到之處；屬於生番所居之地，是其所擁有的勢力範圍。而且這裡所謂「人跡不到」的「人」，乃是僅指漢民而言，「生番」並未包含在內。¹²換言之，「內山」係為清代文獻中描述「生番」生存的未開發的地域。

光緒元年（1875）議開內山以後，為開發山區茶、樟腦、木材之利，墾務漸及內山，隘變成專責保護在界外內山從事墾務之田藳、茶藳、腦藳，及出入番界民人之安全。¹³根據《淡水廳志》所載，當時「樟，有赤樟、粉樟，內山最盛」¹⁴；「樟腦出自內山，附近皆生番地界」¹⁵。漢人追逐樟腦之利，前往山區開發。後來隨著漢民入侵番地等諸多因素，「內山」的範圍便因逐步納入帝國版圖而隨之縮小。¹⁶例如，乾隆 25 年（1760）的《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裡，當時竹塹地區土牛藍線界外的員山仔、犁頭山一帶仍稱「內山」；但在乾隆 49 年（1784）的《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裡，標示為「內山」之處已經向前推移數里至枋寮埔、九芎林一帶。直至光緒 14 年（1888）的《臺灣內山番社地輿全圖》裡，竹塹地區位處更內陸地方的鹹菜甕與油羅等地，已經標示出地名；在清帝國實施「開山撫番」政策下，雖然最後沒有對所有「內山番社」進行絕對的武力控制，但對當時大部分部落的分布，已經呈現出大致的輪廓。

¹⁰ 陳盛韶，《問俗錄》卷六（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無頁碼。

¹¹ 另一方面，根據黃卓權的整理：(1)「內山」是指清政府治臺初期，對版圖界外的「生番」所居之地；也就是政府行政權能夠有效控制的轄屬地區，以東或以外山區的泛稱，並無特定的區域範圍或明顯的行政區劃。其中雖有少數的「歸化生番」，已經「附入版圖」，但是基本上仍然屬於版圖界外「政教所不及」的地區。(2)清政府曾在乾隆年間，設置土牛紅線，定界區隔漢、番。後因漢人越界開墾，土地日闢以後，才促使「熟番」的獵場往近山地方推進，加上「生番」內附為「熟番」等緣故，「內山」的界限，也逐步向東部深山內移，於是「內山」的範圍也就逐漸地縮小。參見黃卓權，〈從版圖之外到納入版圖：清代臺灣北部內山開墾史的族群關係〉，《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 3 卷第 3 期（2013.09），頁 161-162。

¹² 黃卓權，〈從版圖之外到納入版圖：清代臺灣北部內山開墾史的族群關係〉，《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 3 卷第 3 期（2013.09），頁 160。

¹³ 王世慶，〈臺灣隘制考〉，收入王世慶編，《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1984），頁 374。

¹⁴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50-51。

¹⁵ 不著撰人，《淡新檔案》第 14304 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1867）。

¹⁶ 黃卓權，〈從版圖之外到納入版圖：清代臺灣北部內山開墾史的族群關係〉，《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 3 卷第 3 期（2013.09），頁 161。

此段原漢人群互動較為緊張的時期，時間主要是在 19 世紀中葉以後至 20 世紀 1910 年代之前。然而，如今關於漢人從事內山開發、墾殖與拓荒的記憶，仍留存於現下當地漢人社會中。筆者自 2017 至 2023 年間，因多次實地進行耆老口述訪談，引起我注意的是，當地社會至今仍流傳著數種族群互動記憶的敘事。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從官方檔案和文獻著手，從史料分析與歷史地理學的視角，以隘壘型態、土地制度、族群治理和「番界」之關係，進行漢人邊區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分析。¹⁷或是從區域族群關係的角度展開的相關客家研究，¹⁸皆鮮少從當代族群記憶的角度，進行相關的探討。

必須強調，本文所指的「漢人」，是一相對於「原住民」而存在的討論概念，又以「漢人」當中的客家族群之口述敘事，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¹⁹「漢人開發史觀」，係指漢人對於歷史上的開發活動，以及對土地、資源利用和環境改造所形成的觀點和理解。這種觀點通常與漢人的歷史、社會和價值觀相關聯，並將「開發」視為對地方社會發展的重要特徵和貢獻。然而，此種開發史觀通常僅關注漢人自身的開發活動，並忽略其他族群的歷史（例如，泰雅族原住民，以及道卡斯族、凱達格蘭族等平埔族群），而讓此種觀點可能導致對其他人群的劃分或忽視。另一方面，本文所指的「敘事」(narrative) 係以口述、文字等方式傳述記憶、事件、經歷或故事的方式，不僅在傳遞信息，往往還反映出敘述者的觀點、情感和價值觀。筆者即根據漢人開發史的敘事內容、結構、目的來進行敘事類型 (types of narrative) 的探討。

¹⁷ 參見呂佩如，《清代竹塹內山地區的拓墾：以合興庄為主軸的探討（1820-1895）》（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9）；黃卓權，《苗栗內山開發之研究》（苗栗：苗栗縣文化局，1990）；黃卓權，〈臺灣內山開發中的客家人〉，《歷史月刊》134 期（1999.03），頁 66-71。劉名揚，《客家大埔劉派（劉承豪）與新竹內山之開發》（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研究報告，2003）；周錦宏主編，《客家先賢淡水同知李慎彝與內山開發研討會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1993）；施添福，〈清代臺灣北部內山的地域社會及其地域化：以苗栗內山的雞籠溪流域為例〉，《臺灣文獻》第 56 卷第 3 期（2005.09），頁 182-242；施添福，〈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一）：以罩蘭埔為例〉，《臺灣文獻》第 55 卷第 4 期（2004.12），頁 143-209。

¹⁸ 參見張維安主編，《客家與周邊族群關係》（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蕭新煌、張翰璧主編，《臺馬客家帶的族群關係：和諧、區隔、緊張與衝突》（臺北：遠流，2022）。

¹⁹ 由於客家、閩南族群在居住的地理位置上有所差異，因此和原住民族群有不盡相同的互動方式，也許會展現出不同的口述敘事，本文對於口述敘事的分析，即以客家族群為主。

接下來，本文會以桃園的大溪、龍潭；新竹的關西、橫山、竹東等地為範圍，²⁰回顧此種漢人「內山開發史觀」底下，該區域境內於當代建構的地方碑記與方志，呈現何種主流開發史觀的歷史形塑。並檢視與此史觀呼應的記憶敘事之特質，以及彼此的關聯。再以筆者從 2017 至 2023 年間訪查沿山地區原民部落與傳統聚落的眾多口述材料為案例，區分出若干個敘事類型，並佐以相關「墾殖型殖民」(settler colonialism) 之批判性研究，²¹試圖突破以往多聚焦於官方視角與制度性分析的研究框架，採用口述歷史與地方漢人的口述記憶作為主要分析材料，指出漢人墾殖過程中微觀層面的族群互動經驗與記憶實踐，補足既有官方檔案、地方誌等書寫文本較難以呈現的民間視角與情感層次。其次，也企圖深化對「墾殖型殖民」的理論性思考，將權力結構的宏觀治理分析與口述記憶的歷史生產機制結合，呈現出漢人如何在地方社會中演繹、重構及形塑一套記憶觀點，突顯族群與生存正當性的記憶複雜生成機制，拓展既有的墾殖殖民批判之研究，反思當代北臺灣內山地區原漢人群的記憶形塑與敘事。

二、回顧：開發史觀下的地方碑文與地誌

今日桃園、新竹沿山地區的傳統漢人聚落境內，無論是地方上的庄廟、伯公祠與萬善祠，皆留下不少與地方開發史相關的碑文。除了反映出地方社會居民對於歷史的主觀認知；也凸顯地方記憶形塑與歷史再現的若干問題。既往的研究已經指出：基本上，不同廟宇碑文上的多種用詞當中，漢人和原住民有相當嚴重的對立，以至於在碑文的書寫用字上明顯可見使用貶抑的詞彙，比如「醜類」、「凶番」「蠻人」等。²²然而，在分析廟宇碑文與沿革時，筆者更在意這些敘事的因果

²⁰ 此範圍係參考學者施添福進行竹塹地區歷史地理學研究時，繪製之今日桃園、新竹地區的「隘墾區」之人文地理空間，即清代之合興庄、新興庄、明興庄、復興庄、三層庄等處。參見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1)，頁 65-116。

²¹ 筆者將 settler colonialism 翻譯為「墾殖型殖民」，而非「定居型殖民」，是為了更為強調漢人這端對於「內山開發史」與「墾殖史」的記憶形塑與敘事問題，本文即針對此問題進行探討。

²² 陳龍田，〈北臺灣原客關係相關公開文字資料蒐集介紹與分析〉，收於羅烈師主編，《Qmul rhzyal Tayal？開山打林？逆寫北臺灣客庄形成史》(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頁 71-72。

關係及邏輯，背後隱含何種地方記憶形塑的觀念及現象。

既往的研究，已經從桃園、新竹沿山地區二十餘座伯公祠碑文的研究中，注意到這類碑文皆是 1970 至 1990 年代之間所刻，內容則是經由地方耆老講述的內容來轉製成文。雖然在 1980 年代末，「原住民」一詞在當時已經逐漸被臺灣社會所接受，但是這類碑文大多仍以「土著」、「土番」、「生番」之詞來稱呼。許多描述神靈傳說的廟誌碑文使用「土著」、「土番」、「生番」、「番族」用詞，明顯延續了掌握歷史書寫權力者的汙名化邏輯。這個用詞在廟誌的文脈與敘事之下，原住民成為應該、本來就需要被趕走的對象。²³另一方面，在內山地區盛行的孤魂信仰裡，因守隘、防番或開墾而遭受原住民獵首的死者，屍骨今日大多埋葬於漢人村落附近的萬善祠、有應公與大墓塚內。這類死者多數被地方人士賦予「忠義」、「忠烈」或「烈士」等名號，背後實際上存在著和神靈傳說、伯公信仰傳說相類的論述邏輯。一方面，將神靈與伯公的「防番」神蹟傳說作為開墾合法化的認知操作；另一方面，則是將因開墾而被殺害的死者，型塑一種「忠烈犧牲」、「保疆護土」的歷史形象。²⁴顯然是漢人至內山移墾到定居過程中，透過記憶形塑及歷史再現下的產物。

事實上，在伯公祠與孤魂信仰相關的開發史敘事之外，漢人村落庄廟裡的碑文與農民曆、祭典紀念刊行之出版品，也呈現極為相似的話語。此處列舉如下：桃園大溪地區的永福龍山寺沿革：「生番時常下山劫掠殺人」²⁵；三層福安宮沿革：「蕃人侵入殺害庄民」²⁶；石門萬聖堂沿革：「水庫對面尚有生蕃並時而涉水出草為害」²⁷；龍潭地區的三角林三元宮沿革：「有土著、生番，出沒滋擾，民不聊生」²⁸；新竹關西地區上三墩廣靈宮沿革：「時有番人出草，影響民命財產甚

²³ 梁廷毓，〈桃園、新竹地區的原客族群互動與伯公信仰傳說〉，《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21 期（2021.05），頁 59-60。

²⁴ 梁廷毓，〈桃園、新竹地區原漢族群互動下的孤魂信仰與鬼魅傳說〉，《臺灣文獻》第 73 卷第 4 期（2022.12），頁 347-348。

²⁵ 謝維修，《龍山翠微一大溪鎮龍山寺沿革誌》（桃園：大溪鎮龍山寺，2005），無頁碼。

²⁶ 簡祺偉，〈三層福安宮與來臺媽祖沿革簡介〉，收於《大溪福安宮圓醮慶典特刊》（桃園：三層福安宮，2002），頁 2-3。

²⁷ 石門萬聖堂，《石門萬聖堂沿革》（桃園：石門萬聖堂，1988），無頁碼。

²⁸ 三角林三元宮，《三角林三元宮沿革》（桃園：三角林三元宮，1972），無頁碼。

鉅」²⁹；燥坑永和宮沿革：「常有生番出沒無辜殺人」（圖 1）³⁰；老社寮三和宮沿革：「時有山蕃出草騷擾，境遇甚危」³¹；橫山地區內灣廣濟宮沿革：「遭受生蕃猛獸侵害」³²；橫山地區的田寮國王宮沿革：「當時蠻荒僻地，驅番不易」等。³³前述涉及地方開發史的碑文敘述裡，亦明顯呈現特定的用詞及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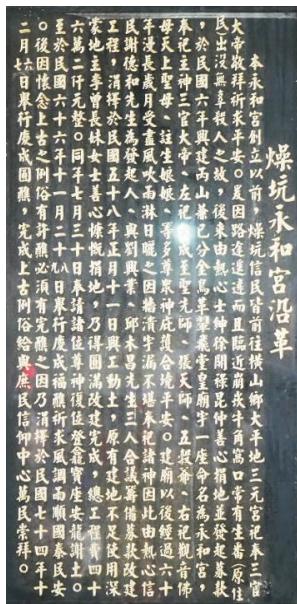


圖 1：燥坑永和宮沿革。筆者攝影。

另一方面，學者羅烈師曾指出，今日客家鄉鎮的官修地方志（例如，大溪鎮誌、龍潭鄉誌、竹東鎮誌、北埔鎮誌等），幾乎都在拓墾史當中，以敵對者的形象書寫原住民族。並認為此地區方志的原住民書寫，呈現集體失憶之現象，亦即曾經在本區生活的原住民部落已經被遺忘，如果沒有被遺忘則呈現汙名化的形象。³⁴除了泰雅族仍被稱為「番人」、「蕃族」之外，道卡斯族與凱達格蘭族等平埔族人在文獻中的身影，早期多以某種未開化的野蠻他者形象存在，而在與漢人

²⁹ 上三墩廣靈宮，《上三墩廣靈宮沿革》（新竹：上三墩廣靈宮，年代未詳），無頁碼。

³⁰ 燥坑永和宮，《燥坑永和宮沿革》（新竹：燥坑永和宮，1985），無頁碼。

³¹ 老社寮三和宮重建委員會，《老社寮三和宮沿革》（新竹：老社寮三和宮，1998），無頁碼。

³² 內灣廣濟宮，《內灣廣濟宮沿革》（新竹：內灣廣濟宮，1982），無頁碼。

³³ 田寮國王宮，《田寮國王宮沿革》（新竹：田寮國王宮，1987），無頁碼。

³⁴ 羅烈師、陳龍田，〈北臺灣原客鄉鎮志的原住民族書寫分析與建議〉，收於羅烈師主編，《Qmul rhzyal Tayal？開山打林？逆寫北臺灣客庄形成史》（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頁 42-43。

開墾者有所接觸之後，又轉換為逐漸同化於漢人社會的開墾者形象。在歷史紀事方面，仍多以漢人開墾的進程作為時間斷點，呈現的是漢人移墾社會的形成史，而非以原漢族群互為主體思考下的時間進程來編撰。而在官修地方志以外的其他開發史書寫文本，包含地方聚落歷史相關的出版品、社區報刊、當地居民的文史調查書等，亦是值得與前述相關研究，進行延伸檢視與對話、分析的材料。

例如，地方文史工作者廖明進所撰寫的《我的家在八結》、《草嶺山的鬼火》，以地方故事集的形式，收集並描寫流傳於桃園大溪一帶的地方開發故事。書中仍以「番人」稱原住民族。³⁵文史工作者羅慶武撰寫的《關西人文志》，也以「番」來敘述漢人開墾過程中遭遇的異族。³⁶關西鎮鄉土文化協會印行的社區報《牛欄河畔》，也以關西境內的人文風土為主題，內容也涉及地方開發史的面向；³⁷由高原社區發展協會編撰的《高原社區拓展史》，亦以漢人為中心的開發史觀為主軸。³⁸所呈現出的歷史觀，雖然與官修的地方誌差異不大，但因為皆是由地方人士所撰寫（而非官修地方志邀請的學者或研究者），有著更為貼近當地社會居民的歷史認知與地方記憶之訊息。

這一套地方社會裡普遍出現的「漢人開發史」敘事底下，當代地方居民及開墾者後裔們，似乎同樣藉由一系列被「侵害」、「侵入」與「騷擾」的論述，來區分敵我之間的關係，既往研究曾指出，「番害」背後的認知形塑，是將自身形塑成受害者的位置，自我弱化成為「番害」的受害者。³⁹並通過「僅有通過拓墾才能取得土地財產」的觀念，反客為主地將原住民視為「外於這片土地」的異族。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地方開發史敘事與地方集體記憶有高度的相似性，一方面，藉由淡化土地侵占的作為，強化土地開墾者與土地的關係；另一方面，透過將他

³⁵ 參見廖明進，《我的家在八結》（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2007），頁 29-65；廖明進，《草嶺山的鬼火》（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2005），頁 114-116。

³⁶ 參見羅慶武，《關西人文誌》（新竹：未刊行，1989），無頁碼。

³⁷ 參見關西鎮鄉土文化協會，《牛欄河畔》（新竹：關西鎮鄉土文化協會，2021），頁 36-37。

³⁸ 參見潘振鏞，《高原社區拓展史》（桃園：高原社區發展協會，2001），頁 103。

³⁹ 梁廷毓，〈龍潭、關西地區的「番害」記憶之口述調查〉，《臺灣風物》第 70 期第 2 卷（2020.06），頁 183。

者自然化，視其為野蠻、同為自然荒野的一部分。以「出草」、「殺人」等說法，將自己的位置調整為「被侵擾者」、「被殺害者」的受害者心理。⁴⁰而漢人設隘開墾、侵奪部落獵場土地的過程，藉由記憶形塑與廟宇碑文的建立，在當代沿山地方社會裡，被合理化為敘述漢人開發史的主要話語。

上述這類地方留存的族群互動記憶，皆是從漢人開發內山的單一視角，以我族為中心來描述與他族關係的敘事，且無論是平埔族或泰雅族原住民，皆以「番」視之。但根據筆者的調查，除了上述地方碑文指向的開發記憶類型之外，地方漢人居民仍存在其他敘事類型的記憶。雖然本節聚焦於地方碑記與地誌書寫，探討「漢人開發史觀」之問題，但本文的研究重心實則在於口述記憶與地方敘事的形塑。筆者採取口述歷史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目的亦在於揭示在書寫體系之外，那些尚未定型、仍帶有糾結與矛盾的地方敘事。這些口述記憶既可能再製「漢人開發史觀」，也可能透露出對原漢關係的另一種情感、倫理或歷史時間感的理解。接下來，本文會區分出若干種原漢人群互動記憶的敘事角度及類型，並探究此類敘事背後隱含的社會觀念。

三、地方記憶的敘事角度及類型

本節主要係探討桃園、新竹地區地方漢人社會中，關於原住民族的歷史記憶與族群敘事型態，透過田野訪談與文本分析，嘗試整理出六種具有代表性的敘事型態。這些敘事不僅反映漢人對過往原漢關係的理解與情感投射，也深刻牽涉到族群邊界的建構、墾殖正當性的記憶型塑。六種敘事類型包括：(一)、「受害者——加害者敘事」；(二)、「原漢合作型敘事」；(三)、「通婚的功利型敘事」；(四)、「恐嚇教化型敘事」；(五)、「道德與文明化敘事」以及(六)、「逆轉型敘事」。筆者將逐一分析各類敘事的內容特徵、背後隱含之問題意涵與其對原漢關係的理

⁴⁰ 梁廷毓，〈桃園龍潭近山地區耆老的原客族群互動記憶〉，《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4期（2017.11），頁136。

解。

(一) 受害者——加害者敘事

前述研究已經指出，當代客家耆老關於「番害」的記憶中，並沒有明顯的「漢人侵逼」說法。在「受番害者」後代的口述中，可以發現諸如「會過來我們村莊殺人頭啦，拿人頭回去」、「會到庄裡殺人」、「我們這邊就被原住民騷擾過」、「他們晚上來，頭就給他拿回去」、「那個隘勇來這邊住，給那個山地人砍頭，給他砍很多」、「那裡以前是隘口，我們這裡的人會去那裡做事，做事就會被殺掉，頭就被剁回去」、「一個姓鍾的老人家……睡覺時候頭被他們剁掉」、「我阿公……晚上在草寮睡覺的時候，那番仔就從後面撲過來，頭就給他剁掉」、「番仔晚上出來，我滿叔公不知道，被殺，頭拿到山上去」、「我阿公的兄弟……在田邊開田就被殺掉」、「我叔公……在打田啦，作田事，白天的時候，頭被剁走」、「我大伯……去河邊抓蝦子，在穿龍塘抓蝦，被殺掉」、「我阿太的爸爸那一輩……去巡水被他砍掉」、「阿相婆……採豬蔡被殺掉」等敘述。在口述者這端，「來殺人」、「被騷擾」、「給他砍頭」、「頭被剁走」、「被殺掉」的說法，將墾民形塑為「被殺害者」。⁴¹反而因為開發過程的傷亡，而主觀上認定自身是受害者，原住民則被以「出草」、「殺人」等說詞，聯繫上「侵擾」的想像，重新被建構成為的加害者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漢人這端不是只被原住民族「出草」的一方，也有留下專門針對族人的報復或殘殺記憶。耆老的口述中，幾乎都流傳的說法是原住民會來出草，而漢人會以殺原住民、吃人肉的方式作為報復。例如，在「就是說很氣憤，你殺我，我也殺你來吃掉」、「家裡的人被殺掉就生氣，食他的肉」、「吃來消氣、報仇的啦」、「報恨阿，殺來煮來吃」、「是因為他會殺人我們很氣，怨恨在啦」、「我們也會殺他，我們當然也要殺他報復阿」、「不甘願啦、氣到，就殺番仔來吃」、「就直接去煮，是洩憤、憤怒嘛」、「心裡很不爽，怨氣很重，不甘願阿」、「吃來

⁴¹ 此處耆老口述轉引自：梁廷毓，〈龍潭、關西地區的「番害」記憶之口述調查〉，《臺灣風物》第 70 期第 2 卷（2020.06），頁 181。

洩憤啦，大家就一起吃」、「以前被殺到很不甘願，就拿來煮番仔肉」等描述當中，「食番肉」是為了報仇與洩恨這一原因，和當時面對家族親人、村莊鄰人被異族所殺，而產生為傷亡者報仇的憤恨情緒與報復心理有關。另一方面，漢人民間社會對「食番肉」的記憶形塑，當中包含味覺、視覺、嗅覺等感官的元素，受訪者會描述肉質「很韌（硬）」、肉味「鹹鹹」；煮起來「很香」等語句，甚至有「咬到那手臂的筋……被扒住」的接觸性描述。並且能夠敘述番肉的口感、氣味與觸感，以及陳述帶有現場觀察感的字句，⁴²這類記憶中，主要呼應原漢衝突歷史中的「殺番賞」與「食番肉」事件。並隱含進一步將原住民視為非人類——山禽、動物或野獸的觀念，可以如畜生一般殺戮並吃食。

筆者認為，此類「受害者——加害者」的敘事模式，建構出一種以漢人墾民為主體、原住民為威脅者的歷史記憶邏輯。從耆老口述資料可見，原住民「出草」事件被強調為漢人遭受無差別暴力侵襲的行為，聚焦於被殺、頭顱被奪的描述，形塑出原住民族作為「騷擾者」、「加害者」的刻板形象。這樣的再現方式，使得漢人在開墾歷史中產生的暴力行為與對原住民土地權利的否定，被置於敘事的陰影之中。值得深思的是，耆老們對於「殺番」、「食番肉」的記憶，並未迴避這類極端報復行為，反而以「報仇」、「消氣」作為正當性的依據，反映出當時原漢衝突的激烈與非理性化之情緒氛圍。更重要的是，前述關於「番肉」的敘述不僅限於事件回憶，而是高度感官化（sensory-laden）與去人化（dehumanizing）的再現形式，將原住民身體具象地轉化為食物與洩恨工具，進一步鞏固了其「他者化」、「非人化」的認知模式。

（二）原漢合作型的敘事

另一方面，在桃園、新竹地區，客家耆老在敘述和平埔族群（例如，道卡斯族竹塹社；凱達格蘭族霧裡社）的互動記憶時，雖然保留對於「平埔番」、「平埔

⁴² 此處耆老口述轉引自：梁廷毓，〈桃園、新竹地區「食番肉」記憶之初探〉，《興大歷史學報》（2023.06），頁 133-169。

仔」用語的他我區辨。但在多數客家耆老的口述中，並沒有主流歷史論述中將 18 世紀以來的原漢互動，視為「漢人欺壓熟番」的過程，雖然會區辨出原漢族群差異，但還是會將平埔族人（例如，霧裡社的蕭家；竹塹社的衛家）放在地方開發史當中的重要角色來看待。但是，雙方沒有流血衝突、合力推進墾地、共同參與開發的這種「合作」關係底下，更多是為時勢所迫的不平等「合作」，甚至將合作夥伴與泰雅族之間的衝突視為「番仔相殺」。⁴³仍從第三者的旁觀角度，以「番仔相殺」一詞來指稱開墾過程中面對兩個原住民族群之間的關係。因此，至少在當代族裔的記憶與認知中，無論是泰雅族或是平埔族，兩者在開墾與守隘過程中發生衝突時，泰雅族／平埔族這「兩種番仔」與客家人的關係就立即被辨識與區隔出來。⁴⁴此種記憶型態下的敘事，仍是以漢族中心式的角度，用「漢化＝文明化」的邏輯來闡述。

筆者認為此類宣稱原漢「合作」的記憶型態，雖然以表面的和諧與互助為主要敘事基調，實則蘊藏著權力不對等與歷史詮釋權的片面、單向運作。一方面，所謂「合作」常被敘述為客家拓墾者與平埔族群（如霧裡社、竹塹社）共同面對山地原住民（如泰雅族）威脅的合作表現。然而，在這樣的記憶形塑中，平埔族人的行動與立場，被重新嵌入漢人拓墾的歷史框架內，其能動性多被簡化為「助漢抗番」的角色，忽略了平埔社群本身的利益協商、地緣策略與族群延續的主體性。另一方面，「番仔相殺」的說法，也反映出漢族記憶中將原住民族之間的社群衝突，視為自然且外在的現象，客家族群則被置於超然的觀察者角色，似乎只是善用時機而非衝突的參與者。此種表述形式固然有其實際歷史情況的基礎，但也凸顯了漢人對原住民族歷史經驗的去政治化與去歷史化操作。事實上，這些「合

⁴³ 筆者認為前人在研究中使用「合作」這個詞時，可能隱含一些尚未被仔細思考的問題。黃卓權也曾撰文指出，施添福認為「客籍墾民之所以能夠立足於保留區與隘墾區……實得力於跟熟番保持良好的族群關係，而能獲得他們的接納和協助」這個說法，放在清代桃竹苗地區的客家與熟番關係中來探討，對於長期處於弱勢中的熟番而言，或許未盡公平。參見黃卓權，〈清代桃竹苗地區內山開發史的族群關係〉，《客家先賢淡水同知李慎彝與內山開發研討會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政府文化局，2003），頁 165。

⁴⁴ 梁廷毓，〈桃園、新竹沿山地區平埔、泰雅與客家族群互動記憶〉，《桃園文獻》第 12 期（2021.09），頁 87-90。

作」本質上是一種在時代壓力（例如：官方的番界政策、地方治安與漢人的墾殖經濟邏輯）下的策略性聯合，其中隱含著族群邊界的重組與再分配認知。

進一步論，這類敘事也暗示了「漢化」等於「文明化」的邏輯。在許多客家耆老的說法中，平埔族被視為「較漢化」的族群，與「野蠻」的泰雅族形象相互對照。此種言語思維不僅折射出清代以來官方對原住民族分類治理的餘緒（即「熟番」與「生番」之分），也反映出「文明化」的殖民論述如何潛移默化地滲入地方記憶之中。即便這些耆老本身未必自覺使用了殖民性話語，但其言談依舊再生產了一種族群階序的固化想像。

（三）通婚的功利型敘事

在漢人與泰雅族人（多數為清代文獻中的「生番」）通婚的記憶方面，當代客家耆老的認知中，無論當時漢人進行「牽番婆」、「討番妹」的原因，或是泰雅人「收養」漢人嬰孩而產生的「通婚」關係，都涉及到當時「生番」的獵首、出草習俗。在將原住民女性稱為「番婆」或「番妹」的用語之下，仍有輕蔑的意思，呈現出我族／他族的區辨。然而，從互動關係的角度，實際上是一種以相互承認彼此的存在與作用力為前提，並進行若干方面利益關係的算計過程：一方面在雙方通婚之後，和特定族人或山區部落之間訊息互通有無、避免觸發嚴重誤解及激烈的衝突關係之契機；另一方面，也在特定家族及個人層面，避免被部落的「番親」獵首，減緩「番害」在自身家族內發生的機率。⁴⁵因此，「通婚」記憶背後的認知，與前述漢人與平埔族「合作」開發的敘事仍有差異。在區辨我族與他族為基礎的「通婚」認知背後，和漢人認為其藉由「通婚」行為，可以避免被原住民「出草」的觀念有緊密關聯，且具有特定之功利性與目的性。

筆者認為，當代客家耆老所敘述的「牽番婆」、「討番妹」現象，表面上是一種跨族群的姻親互動關係，但實質上仍深植於族群邊界的清楚認知劃分與策略性

⁴⁵ 梁廷毓，〈桃園、新竹沿山地區的原漢通婚與收養記憶〉，《臺灣文獻》第 75 卷第 2 期（2024.06），頁 191。

的行為模式。此種關係型態雖以原漢通婚為核心，卻未必會伴隨著族群融合的內在認同改變，反而更多地是一種漢人在生存策略上的體現。其背後所映射的是一種風險管理與安全考量的實用性邏輯。一方面，「番婆」、「番妹」等用語的延續與使用，顯示出即便在建立婚姻關係之後，泰雅族原住民女性仍未被真正納入漢人社會的平等成員位置。她們在這一套敘事中仍被視為「他者」，甚至是位處漢人宗族關係中的邊緣、次等之存在。此種敘事的延續，不僅反映了原漢通婚所無法消除的族群歧視與階序觀念，在當代客家耆老的口述中，這類語彙雖不一定帶有強烈敵意，卻往往反映出文化潛意識中根深蒂固的漢族中心主義；另一方面，和前述漢人與平埔族的「合作」的敘事不同，原漢通婚的記憶——特別是和（過去被視為「生番」）泰雅族的通婚敘事——大多集中在地方上的漢人家庭或宗族層面，鮮少轉化為一種地方開發史的榮光敘事（僅有少許的孤例）。泰雅族形象仍停留於潛在威脅者和侵犯者的角色，即使是在通婚之後，亦難以轉化成可供誇耀的地方家族身世及象徵資本。這顯示出不同原住民族群在漢人的地方記憶體系中被編排的位置差異，也凸顯出漢人的地方記憶如何根據不同對象的歷史互動層次，而展現出階序化的敘事問題。

（四）恐嚇教化型敘事

除上述記憶及敘事類型之外，也有幾種目前較少被探究的敘事。以桃園龍潭的銅鑼圈一帶村落為例，因為地方上曾發生竹頭角社（今桃園市復興區）泰雅族人來村莊獵首，並抱回漢人兒女回部落領養的事情，並在地方社會廣為流傳。⁴⁶後來，地方上形容一個人個性粗野、暴躁時，眾人會戲稱其「竹頭角來的人」⁴⁷。以此比喻其如同那邊的「番仔」一樣不講理。另一方面，新竹關西、橫山一帶聚落居民耆老，則是會以「番仔會殺人」來威脅很調皮、哭鬧的小孩：「你不聽話，

⁴⁶ 潘振鏞，《高原社區拓史》（桃園：高原社區發展協會，2001），頁 103。

⁴⁷ 筆者訪談，蕭昌衡耆老口述，時間：2017.06.21；地點：桃園龍潭銅鑼圈大庄聚落。必須注意，本文限於篇幅，筆者對口訪素材的引用，只在因應概念討論或敘事類型時，以擇句、摘要、匯集的方式使用，並聚焦於敘事類型和模式的討論。

等下番仔就來囉」⁴⁸；「再哭的話，番仔晚上就來剁人頭喔」⁴⁹。延續內山地區過往面對「番仔殺人」的恐懼，直至 1950 到 1960 年代出生的長輩，不少人皆有聽聞這類小時候被祖父母或家長威嚇時的用語。這類地方敘事背後，皆隱含過去漢人視原住民為野蠻群體形象的觀念，一方面，並將其轉化用於形容個性無禮的漢人；另一方面，是以其過往帶給漢人聚落的恐懼感，來教育或威嚇幼齡孩童，令其要乖順聽話。

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將過往族群衝突或恐懼經驗，內化為身家教育手段的語言實踐。如此的敘事操作，不只再現了歷史上的原漢衝突，也將原住民形象定調為潛在的危險者，使得即使在沒有流血衝突的和平時期，原住民的形象仍被構建為無禮、粗野與兇暴的「他者」。一方面，這類敘事形式成為漢人長輩對下一代進行社會規訓的重要工具。透過「番仔會殺人」的話語，孩童被教育要乖順與服從。將外在的威脅因素內化為行為規範的認知，構成了一套繞經他者化而形成的社會教化敘事；另一方面，亦顯示了原住民形象在漢人地方社會語言中的轉譯方式——不僅保留其歷史野蠻印象，更進一步被用來形容漢人社群當中的「不講理者」。此種用語轉化，實際上鞏固了漢人社會對「文明／野蠻」的建構，也強化了原住民的邊緣化位置，因為他們在這套話語中，不再只是實存的原住民社群，而是粗魯、暴力的語言象徵符號。

必須注意，由於口述記憶本身常融合不同時期的經驗與感知，若不加以釐清所對應的歷史時期，恐怕會模糊此類語彙的歷史根源與意義轉折。實際上，這類針對原住民的他者化、恐懼化語彙，其歷史根源可追溯至清領時期的漢人拓墾過程。當時「內山」地區即為地方漢人普遍處於與原住民之間的衝突區域，口述記憶中屢次提及的「番仔殺人」等敘事，即反映了這一時期原漢人群對峙的生存狀態。進入日治時期後，隨著理蕃政策的推進與蕃地管控的強化，官方論述雖朝向

⁴⁸ 筆者訪談，范振雲耆老口述，時間：2019.07.18；地點：新竹關西玉山聚落。范振雲耆老現年 79 歲，生於關西鎮的大庭頂。

⁴⁹ 筆者訪談，吳姓耆老口述，時間：2020.01.09；地點：新竹橫山油羅聚落。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吳姓耆老稱之。吳姓耆老現年 82 歲，生於橫山鄉的油羅店。

「教化」與「文明化」的方向轉型，原住民不再被簡單視為敵對、殺戮的對象，而被納入殖民治理體系當中。戰後時期至 1990 年代以前，國民政府基本上延續乃至加深了山地原住民在臺灣主流社會中的文化他者與邊緣性位置。因此，1950 至 1960 年代出生的長者經由祖父母口中的恐嚇語，實際上可能是歷經清代拓墾的恐懼、日治時期的理蕃政策、以及戰後時期的污名化過程中，多重時代及政治因素相互交織之下的話語遺緒。

（五）道德與文明化敘事

還有一種極具文明化與道德教化意味的敘事，認為「番仔不殺好人，只殺壞人」⁵⁰；「我們家以前對待番仔很好，所以他們說不用怕，番仔不會殺我們家的人」⁵¹。背後隱含以漢人是否有侵佔部落土地、人性良善與否、是否有欺騙族人等作為，決定原住民是否會對其進行「出草」的認知。另一種是具有文明進程及文化優劣判斷的敘事：「現在『番仔』已經變『人』了」；⁵²「番仔不會『番』了」⁵³。此種敘事類型，皆涉及到今人對於原漢互動記憶的型塑，以及對於他／我；番／人；野蠻／文明；原住民／漢人之間的刻板觀念之二元區分。此一敘事將原住民族群的行為與「漢人是否有德行」、「是否為好人」聯繫起來，並且在語言層面上展現出「番／人」、「野蠻／文明」這類強烈的對立意識。

一方面，這類敘事並非單純反映歷史的建構，而是在後設層次上，藉由對歷史的道德化與倫理化之詮釋，來強化漢人中心式的文明論述及社會秩序。例如，「番仔不殺好人，只殺壞人」這類說法，將原住民的出草行為從族群衝突或抵抗行動中去脈絡化，轉化為一種道德的裁決——出草變成懲惡揚善的正義行為。但

⁵⁰ 筆者訪談，葉仁貴耆老口述，時間：2017.08.10；地點：桃園龍潭黃泥塘聚落。葉仁貴耆老受訪時 83 歲，生於龍潭區的三角林。

⁵¹ 筆者訪談，李姓耆老口述，時間：2019.02.15；地點：桃園大溪田心仔聚落。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李姓耆老稱之。李姓耆老現年 87 歲，生於大溪區的阿姆坪。

⁵² 筆者訪談，張姓耆老口述，時間：2020.03.20；地點：桃園龍潭大坪聚落。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張姓耆老稱之。張姓耆老現年 75 歲，生於龍潭區的大坪。

⁵³ 筆者訪談，王瓊珠耆老口述，時間：2023.11.25；地點：新竹關西湖肚聚落。王瓊珠耆老現年 86 歲，生於東山里的湖肚。

此種關係的重塑，依然立基於漢人為主體視角的道德敘述模式：是否為「好人」的判準，仍由漢人這端來界定。另一方面，從「我們家以前對番仔很好，所以不怕他們」這類記憶表述，實則強調的是「我們是良善的漢人」，並藉由族群互動中的免於受害的經驗，來證成自身的合法性與良善性。這不僅將人們是否被原住民出草的事情，誤讀、錯解並合理化為一套「報恩／報仇」的邏輯，也強化了漢人作為歷史行動主體的記憶位置。

「番仔現在已經變人了」則預設了原住民族過去不被視為「人」，而是處於一種尚未開化的、野蠻的存在。透過這類文明化階序的敘事，原住民被置入於「未開化→接觸→逐步文明」的線性過程當中，此類敘事背後強烈的「他／我」、「番／人」、「野蠻／文明」二元劃分，即使在表面上在呈現漢人自身的善意和道德性，其內部仍是一種藉由貶低和劃分而來的等級秩序之表述邏輯。

（六）逆轉型的敘事

另一種是帶有反思意味的敘述：「佔人家土地，我們自己才是『番』」；⁵⁴「我們客家人才是真正的『番』，欺負原住民、佔走他們土地」。⁵⁵這種說法將過往開發歷史上，漢人視己為「人」；視原住民為「番」的邏輯逆轉，用於反省漢人先民拓墾、設隘時的侵逼行為。筆者認為，此種逆轉性的敘事邏輯，可能是受到臺灣自 1990 年代以來的本土化以及原住民運動之後，相關的國家政策與臺灣史論述的影響，而改變了本來的觀念。也顯示「漢人開發史」的史觀在現下的臺灣社會似乎有所鬆動之現象。筆者認為，這是蘊含反身性（reflexive）與受到時代變遷因素而形成的敘述模式。它標誌著地方記憶中從單一向度的漢人主體視角，逐漸轉向對自身歷史角色的省思，並在一定程度上納入對原住民族的虧欠感。⁵⁶不

⁵⁴ 筆者訪談，范姓耆老口述，時間：2022.07.16；地點：新竹關西玉山聚落。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范姓耆老稱之。范姓耆老現年 72 歲，生於關西鎮的白石下。

⁵⁵ 筆者訪談，陳姓耆老口述，時間：2018.05.02；地點：新竹關西大竹坑聚落。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陳姓耆老稱之。陳姓耆老現年 78 歲，生於關西鎮的大竹坑。

⁵⁶ 事實上，在學者詹閔旭也曾研究過 20 世紀下半葉，在臺灣文學的諸多書寫中，漢人的原住民敘事所內涵的「贖罪」意識。參見詹閔旭，〈重構原漢關係：臺灣文學裏原住民族、漢人移民與殖民者的跨種族接觸〉，《中山人文學報》第 48 期（2020.01），頁 73-95。

同於前述以他者化標記、恐懼或功利性為主軸的敘事類型，此一敘事往往來自於當代漢人地方社會中少數具有反思意識者的聲音，但它的出現本身，已經動搖長久以來的「開墾=進入無主之地」的敘事邏輯，並透過對過往行為的自我檢視，漢人被重新放置於侵略者的位置。

仍須注意的是，今日該區域的地方高齡耆老使用「番仔」一詞時，使用者可能並無刻意歧視之意（往往是不自知其用詞在現代社會裡的嚴重性），而是當地耆老自幼至今地方生活圈內的慣用語。雖然多數耆老已知「原住民」一詞，也知曉「番仔」一詞不能在族人面前述說，甚至知道此語詞會令族人感到相當氣憤，卻仍時常聽見高齡耆老們私下聊天時使用。相對地，沿山地帶的泰雅族人也知情漢人私下汙穢的現象。例如，在新竹關西馬武督部落的數位受訪者皆曾講述：「以前客家的老人家，看到我們會罵我『番仔』」⁵⁷；「這裡老一點的客家人會說『番仔殺人』」⁵⁸；「他們會罵我媽媽『番媽』，很難聽的話」⁵⁹。儘管近年來已經有一些研究者針對新竹桃園、地區的隘勇線及理蕃戰爭、泰雅族人吟唱的 Lmuuhuw，進行原住民觀點的紀錄，但大多聚焦於部落的傳說、遷徙史和文化復振，較少涉及對地方上部落這端的原漢互動關係之口述採集與分析，有待未來進一步深入研究與探討。

表一：六種敘事類型之整理（筆者製表）。

敘事類型	敘事特徵與重點	隱含的觀點與意涵
受害者——加害者敘事	漢人墾民為受害者；原住民為加害者，強調「出草」、「殺人」、「砍頭」等番害經驗；漢人因家族受害產生報復心態，甚至出現「殺番、食番肉」	強化原住民為侵擾者、入侵者形象；並將原住民非人化與他者化，遮蔽漢人拓墾過程中的暴力與掠奪歷史。

⁵⁷ 筆者訪談，張姓耆老口述，時間：2018.07.14；地點：新竹關西馬武督部落。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張姓耆老稱之。張姓耆老現年 76 歲，生於關西鎮的馬武督。

⁵⁸ 筆者訪談，周姓耆老口述，時間：2019.02.10；地點：新竹關西馬武督部落。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周姓耆老稱之。周姓耆老現年 80 歲，生於關西鎮的馬武督。

⁵⁹ 筆者訪談，彭姓耆老口述，時間：2019.05.03；地點：新竹關西戈尤浪部落。因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彭姓耆老稱之。彭姓耆老現年 69 歲，生於關西鎮的馬武督。

	等記憶。	
原漢合作型敘事	漢人與平埔族(霄裡社、竹塹社等)「合作」、「共同開墾」；卻以「番仔相殺」描述泰雅族與平埔族的衝突，漢人以旁觀者視之。	所謂的「合作」隱含不對等權力關係，將平埔族納入漢人歷史敘事，消解其主體性。反映「漢化=文明化」的殖民論述餘緒。
通婚的功利型敘事	漢人與泰雅族女性通婚，作為減少「出草」、降低被殺風險的策略；語言中帶有貶抑語彙（如「牽番婆」、「討番妹」）。	通婚敘事隱含社會階序與漢人中心主義，即使婚姻發生，原住民仍是「他者」，反映功利性聯姻邏輯。
恐嚇教化型敘事	利用「番仔會殺人」等恐嚇語言教育孩童，反映歷史上原漢衝突的恐懼經驗被內化為社會教化手段，將原住民形象定格為兇暴他者。	原住民被構建為潛在危險者與野蠻他者，漢人社會透過此敘事形成規範與社會秩序；同時反映其族群邊界的建構及排除。
道德與文明化敘事	認為「番仔只殺壞人、不殺好人」，強調漢人是否「有德行」決定原住民行動，展現對原住民的道德化判斷與文明層級。	建構出文明進步的階序，漢人中心史觀強化族群分化與文化優越感；道德敘事掩蓋暴力衝突，將歷史轉化為倫理秩序的維護。
逆轉型敘事	反思漢人先民侵佔原住民土地，指出「佔人家土地的才是真正『番』」；逆轉過去漢人自視「人」、原住民為「番」的分類。	帶有自我批判與反思意味，強調漢人作為侵略者的角色，挑戰既有的族群二分；敘事多來自當代具有反思意識的少數漢人聲音。

需要強調的是，上述於戰後 1950 到 1960 年代出生的耆老口述者，在地方歷史的經歷或記憶生成上，實際上處於一種斷裂與接續之間的時代位置。由於他們大多無法親身經歷日治時期至清朝時代，對於那段歷史的理解只能通過間接的管道——例如家庭內的口述傳承、地方的集體傳說——這些口述的傳承過程本身，

可能就受到多重社會因素的影響（包括敘述者的立場、族群互動經驗或身分政治與家族背景）。因此，這些「記憶」往往帶有選擇性和片段化的特徵，難以完全視為「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而是一種「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由於此種記憶敘述具有選擇性、片段性與敘事策略性，反映的往往是表述者自身所處的位置與其意識形態，而非單純對過去經驗的再現。

要言之，戰後 1950 至 1960 年代出生的耆老口述者，在面對地方歷史的記憶時，他們無法直接經歷清領與日治時期的原漢衝突與殖民治理，但又身處在這些歷史餘緒尚未完全消散的社會環境中。因此，他們所能接收到的歷史資訊，主要來自上一代家長或祖輩的講述與地方傳說的流傳；這些口述形式在傳遞過程中，往往經歷了家庭倫理、身份認同，以及戰後國族意識形構等因素的再詮釋，進而造成敘事內容的選擇性與轉化。然而，這些敘述往往並非來自親身經驗，而是從上一代的語言碎片與社會氛圍中拼貼而成。此種呈現出時間疊加性的敘事特質，正反映出口述者在記憶型塑上的雙重處境——一方面，是地方記憶的接收者與傳遞者；另一方面，又無可避免地以戰後時期的社會經驗來重塑清治與日本殖民時期的歷史圖像。儘管如此，筆者認為這些傳述內容仍有其重要性，並非毫無價值。相反地，正是這些錯位、拼貼與再詮釋的過程，揭示了地方歷史記憶在不同政權更迭與族群互動下的變形軌跡，也提供我們觀察集體記憶如何經由語言、代際傳承與情感邏輯而形構出的地方性視角。

一方面，反映了地方社會如何在歷史的長流中建構自身的集體認同。特別是在歷史資料有限、官方敘述缺乏或壟斷的情境下，這些具有主觀性意涵的「記憶」為我們理解地方歷史提供了獨特的角度。甚至揭示了漢人地方社會對原漢人群互動歷史的情感反應，以及在代際傳承中所隱含的價值觀和歷史認知。換言之，雖然這些地方敘事未必精準或全面，但它們作為「記憶」的一部分，構成了地方歷史研究的重要基礎，也為「歷史」和「記憶」之間的複雜關係提供了討論的空間。因此，我們在看待這些「記憶」時，應該保持一種批判性的態度——既承認其可能的偏見與片面性，也認識到它們在討論記憶與歷史認知中的重要性。

具體而言：（一）客家耆老的記憶中，沒有明顯的「漢人侵逼」說法，而是將墾民形塑為「被殺害者」，將原住民形塑為「加害者」；（二）客家耆老的口述中存在著針對原住民的報復或殘殺記憶，並將原住民視為非人類的觀念（動物化為山禽肉），以「食番肉」作為報仇與洶恨的方式；（三）在漢人與泰雅族人通婚的記憶中，涉及到當時「生番」的獵首和出草習俗，而通婚行為是為了達到避免被原住民「出草」之目的；（四）甚至轉化成具備教育或威嚇孩童之敘事目的；（五）或是具道德教化意味的敘事。可以發現，這類關於「番害」；「食番肉」；「番仔相殺」與「討番妹」等記憶，皆隱含漢人開發史觀的敘述邏輯；揭示出在開墾過程中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衝突和敵對關係，以及其中涉及的報復、恐懼和區隔等諸種因素。並且以漢人為中心的視角，將原住民視為「番」。

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本節所分析的地方漢人記憶中，關於抵禦原住民襲擾的敘事結構，與清代和日本殖民時期官方論述中對「番界」和「蕃地治理」的話語，具有某種近似性。兩者皆在山區拓殖及發展史觀的脈絡下，將山地原住民描述為「開發的阻礙因素」、「未開化的存在」，甚至訴諸於非人、野獸化(bestialization)的表述方式，將其塑造成漢化及文明化進程中所必須克服的對象。然而，這些話語雖共享某種結構性視角，兩者之間仍存在關鍵差異。清代官府與日本殖民政府多自國家治理與邊境管控的角度出發，藉由法律、軍事與特定制度來強化其文明化與現代化任務的正當性；相較之下，地方漢人民間的記憶則更多聚焦於生存實踐與空間競逐的日常經驗，並強調在艱困環境中維繫家族與聚落之倫理正當性。

特別是在部分耆老口述中反覆出現的「食番肉」敘事，雖然表面上延續了將原住民去人化的思維，但更深層地來看，其實是一種在極端暴力中建構族群界線與強化自我正當性的話語。這類敘事邏輯在日治時期的官方文書中幾乎缺席，顯示出它更屬於民間在原漢衝突經驗中內化出的一種記憶形式，具有其地方性、情感性與民間性的原漢衝突記憶之特質。接下來，筆者會以漢人從移墾到定居沿山地區的歷史過程，思考漢人的「開發史觀」與「墾殖型殖民」之關係；亦從原住

民族人的記憶角度，討論歷史敘事及記憶的實踐，在今日桃園、新竹沿山地帶需要反思的面向。

四、墾殖型殖民與歷史敘事的反思

過去清代文獻裡被指稱為「內山」的北臺灣桃園、新竹淺山及丘陵一帶，如今已是漢人聚落遍佈的景況。既往研究已經初步指出，荷蘭東印度公司率先於 1624 年在臺灣南部建立了熱蘭遮城，並開始招募中國東南沿海的漢人渡海拓墾，為臺灣奠定了「墾殖者社會」(settler society) 的雛形。⁶⁰ 1662 年鄭成功將荷蘭殖民者逐出臺灣，並按照明朝的典章制度在島上建立第一個漢人政權，沿襲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殖民策略，持續招募漢人墾殖拓墾，使臺灣不論是在人口結構抑或經濟生產關係上都符合了墾殖殖民地的條件。1683 年之後，臺灣進入清帝國統治時期，渡臺漢人移墾者的墾殖型殖民拓墾行動，則逐漸由臺南府城地域為核心，逐漸往北部的臺中、竹塹及臺北一帶擴張，而在 18 至 19 世紀時，這些地區皆已獲得漢人群體進一步的掌握。⁶¹ 直至 19 世紀末葉，桃園、新竹沿山地區已經從帝國邊區的漢人移墾社會，逐漸轉變成「墾殖者社會」。因此傾向將臺灣定位為一種「墾殖國」(settlers' state)，也就是由「墾殖殖民者」(settler colonizer) 建立起的國家。相較於一般的「移民」(immigrant) 多半只求「寄居社會」(host society) 的接納和包容；「墾殖者」則是企圖建構永久居住的「墾殖殖民社會」(settler society)。⁶²

學者鄧津華 (Emma Jinhua Teng) 也曾指出，清帝國在邊區的實施的屯墾制

⁶⁰ 蔡林縉，〈新南方論述《邦查女孩》與定居殖民批判〉，《中山人文學報》第 51 期 (2021.07)，頁 56。

⁶¹ 參見 Teng, Emma Jinhua.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p. 62-69; Shepherd, John R. *Taiwan bianjiang de zhili yu zhengzhi jingji* (yiliu linglingyiba lingling)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2 vols. Trans. Lin Wei-cheng et al.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70-190.

⁶² 施正鋒，〈原住民族的歷史重建〉，收於施正鋒、許世楷、布興·大立主編，《從和解到自治：臺灣原住民歷史重建》(臺北：前衛，2002)，頁 305-332。

度，及其漢人開墾者的佔領土地行為，已經與晚近殖民帝國主義的某些權力支配面向，相當的相似。⁶³此種「墾殖型殖民主義」聚焦在漢人「墾殖者」(settler)由殖民帝國支配殖民地之後，憑藉著人口數量及後代繁衍得方式，擴展並行使力量上的優勢，以便逐漸達到實質佔領土地之目的，甚而能夠進一步取代(replace)原居地的原住民群體及其原有社會生產力的殖民支配模式。⁶⁴當中的墾殖殖民結構往往是由漢人「墾殖者」自我繁殖，進而成為當地的優勢族群與社會生產力來完成，並不需要原住民族群體來定義自身的存在，⁶⁵著重在於將殖民地視為永久居留的家園。因此，墾殖型殖民與漢人內山開發史密切相關。前者是指漢人「墾殖者」在一個地區定居，並進行長期的開發活動；而漢人開發史則是指漢人在特定地區進行開墾、移民和定居的歷史，並且常伴隨著對原住民族群的壓迫和剝奪。並建構一套敘事進一步鞏固漢人移墾至定居過程的必然結果。任何人群面對衝突爭議的過去，往往會揭露出一種聯繫過去與現在之間特定關係的預設，此種預設不僅是歷史解釋權的爭奪、更是政治權力的競逐，而記憶的論述（discourse of memory）成為這當中關鍵的因素。因為記憶是一種心智的活動，透過記憶的論述，不僅可以建構自我意識，更是人們形成認同的核心要素。⁶⁶以此便可以理解，在漢人開發史觀底下呈現出的幾種敘事類型，皆可能在持續鞏固他族／我族之間的社會性邊界。進而言之，此類記憶不僅足以營造地方群體的歸屬，更能維繫傳統地方社會的關係，是一種用來強化聚落認同的凝聚策略。然而，集體記憶是對過去經驗的集體創造行為，在凝聚群體意識、再造社會秩序之外，由於涉及不同

⁶³ 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楊雅婷譯，《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頁 289-300。

⁶⁴ Wolfe, Patrick.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thropology: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an Ethnographic Event* (London: Cassell, 1999) , pp 163.

⁶⁵ 相關文獻可參見 Wolfe, Patrick.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thropology: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an Ethnographic Event* (London: Cassell, 1999) , pp1-2、27; Wolfe, Patrick.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Elimination of the Nativ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8. no. 4 (2006) , pp 393; Veracini, Lorenzo. *The Settler Colonial Pres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16-26.

⁶⁶ 詹美華，〈記憶的政治：集體記憶和集體遺忘〉，（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第 48 期，https://epaper.naer.edu.tw/edm.php?grp_no=3&edm_no=48&content_no=1347，瀏覽日期：2025.02.16）。

位置之間的折衝協調，也牽涉權力競逐與利益分配，進而呈現選擇性記憶與遺忘的現象。換言之，在記憶重構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漢人這端往往會刻意強化某些細節或遺漏某段故事，甚至建立一套化繁為簡的敘事邏輯，以便讓地方記憶的建構更加穩當。

筆者以地方口述資料為基礎，初步整理出若干關於原漢衝突的記憶類型，但更值得深入探究的是，這些敘事如何被保存、演出並傳遞至今。正如口述歷史學者林恩·阿布拉姆斯（Lynn Abrams）所強調的，口述並非單純再現過去，而是一種當下語境中對過去的表述行動（performative act）。⁶⁷此種表述帶有其策略性，受限於敘述者的身分、社群的期望、權力關係，以及可被接受的文化符碼（culturally sanctioned codes）。從這個角度，地方上流傳的「番仔殺人」、「食番肉」、「番仔會來抓小孩」等恐懼性的敘事，不應僅被理解為單純的歷史遺緒，而更是一種恐懼記憶的歷史再生產：它在世代傳遞中透過重複（repetition）、修辭（rhetoric）及語境性表演（contextual performance），強化了某種族群界線與地方倫理秩序。這些敘事往往並非出於單一敘述者的創造，而是依循一套地方性的話語規則（narrative conventions）與情感準則（emotive norms）被製造與不斷再製。

另一方面，這些記憶的傳述方式也深受宗族或地方社會內部的倫理結構、鄰里社群的語言互動模式，以及不同時期的國家教育系統的框限所影響。這也呼應了既往口述歷史學者關於「敘事的生產性」（narrative productivity）的論述：即記憶並非呈現為一種資料庫的型態，而是某種因應當下需求所驅動的意義創造性實踐（active process of creation of meanings）。⁶⁸從此一觀點來看，吾人更能理解所謂的「受番害者」的敘事不只是某段歷史的殘餘記憶，而是一種仍持續發揮其象徵功能的社會性話語：它既是一套地方對於自身墾殖正當性與劃分族群邊界的辯護言論機制，也是讓原住民族作為「他者」形象得以持續流通與調節的歷史話

⁶⁷ Abrams, Lynn. *Oral History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 130-162.

⁶⁸ Portelli, Alessandro. "What Makes Oral History Different?" In: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eds.)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p.63.

語形式。

此種記憶是一個強勢群體用來維持、發展與傳遞他們對「過去」經驗的共同印象之能力、過程及結果。是在集體脈絡中（*collective context*）所建構與組織，一切的事件、經驗以及認知，並透過個人與他人的互動、形塑所產生。⁶⁹記憶除了被認定與某一人群有關的過去經驗之外，更重要的是將意義賦予這些經驗的「參考架構」，亦即一個關於過去集體經驗的「敘事模式」，也可以說，集體記憶的發展、維持與變遷主要也就是它的意義參考架構（即敘事模式）的發展、維持與變遷。因此，集體記憶不僅涉及「記憶什麼」的「內容」層面，更涉及「如何記憶」的「意義」層面。⁷⁰在墾殖型殖民的過程中，記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墾殖者」通常以自己的歷史、文化和價值觀來建立墾殖殖民地的記憶體系，試圖消除或壓抑原住民族群的記憶和歷史。此種記憶建構常常與「墾殖型殖民主義」的敘事鞏固相互關聯，以強化「墾殖者」的開發行為合法性；另一方面，墾殖型殖民者往往也將自己的史觀加諸於墾殖地，以塑造和強化他們的土地使用權力。這種史觀通常反映了漢人「墾殖者」對歷史的詮釋和理解，並常常偏狹於他們自身的文化和價值觀。

在這類開發史觀下的記憶和敘事裡，常常著重於漢人「墾殖者」的英勇事蹟、開拓精神和文明使命（例如，化荒埔為良田、開山打林或篳路藍縷的故事），並刻意忽略與扭曲原住民族群的歷史位置。「墾殖者」通常涉及對原住民族的驅逐或邊緣化行為，雖然原住民族是墾殖地上的原住者，但漢人「墾殖者」時常主張對土地、資源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從而建立起新的地方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因此，漢人「墾殖者」對原住民族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包括土地被剝奪、文化和語言喪失、社會邊緣化等，在今天仍然塑造著北臺灣沿山地區的漢人開發

⁶⁹ Pennebaker, James., & Banasik, Becky L. "On 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ollective memories: History as social psychology." In James Pennebaker, Darío Paez, & Bernard Rimé (eds.) ,*Collective memory of political events: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7) , p.4.

⁷⁰ 參見蕭阿勤，〈「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臺灣史研究》第 6 卷第 2 期（2000.10），頁 77-138。

歷史觀。在此意義下，筆者認為，漢人開發史觀當中對原住民族的貶低或輕視之敘事類型，也是「墾殖型殖民主義」在北臺灣沿山地區漢人社會裡的另一個重要特徵。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已有論者針對這些問題提出反思：過去「番界」所呈現的，不僅是漢人的移墾開發史，同時更是原住民族被迫遷移的血淚史。並且質問「當我們開心地暢談浪漫臺三線、漢人的勤勉時，有多少人還記得，這條路也代表了原住民族族顛沛流離，被外來殖民者逼迫、遷徙、同化，甚至發生戰爭衝突的歷史記憶」；⁷¹「也許對某些族群而言，浪漫臺三線是一個很棒的憧憬，但對平埔族群來說卻是血淚交織的歷史痕跡」；⁷²「臺三線如果浪漫，恐怕是因為我們對於歷史太多的遺忘與重建」。⁷³這類評論皆可以視為對漢人這一「墾殖殖民者」及其開發史過程的批判。

對於被殖民的原住民族群而言，他們的記憶常常被消失、扭曲或壓抑。原住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知識觀點常受到忽視和侵害。但族人也通過不同的方式保持著自己的記憶和身份（例如，口頭傳承與記寫）。從泰雅族原住民族這端的記憶型塑方面，既往研究已指出泰雅族「獵首」漢人的記憶，以當代部落耆老的角度，不少受訪者會以今日的道德價值去衡量先人的行為，並透過對 *gaga* 觀念的理解，連繫上今日部落與族人的境遇。既認為歷史中存在著「漢人侵逼」，也認為過往祖先殺人違反了 *gaga* 祖律，讓當代族人在面對「祖先殺人」招致的厄運時，較多是對殺人行為的反省與後悔，以至於後代會產生厄運。⁷⁴若試著比較兩者敘述的差異：主要在於當代泰雅部落耆老在「出草」漢人的記憶中，也沒有族人是弱勢群體而被欺壓的說法，反而將自我放在動用「殺人」行為的強勢者位

⁷¹ 李金賢，〈浪漫臺三線：你們的篳路藍縷，是我們的顛沛流離〉，（來源：《今周刊》，<https://www.busines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54685/post/201812250004/>，瀏覽日期：2025.02.16）。

⁷² 王商益，〈臺三線上真有「三條線」，還一點都不浪漫！歷史上的「臺三線」如何成為原住民的血淚痕跡？〉，（來源：《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0810>，瀏覽日期：2025.02.16）。

⁷³ 羅烈師，〈沒頭祖公：羅華酉魂斷下橫坑之謎（1806-1821）〉，《新竹文獻》第 67 期（2017.09），頁 24-31。

⁷⁴ 梁廷毓，〈桃園、新竹沿山地區泰雅部落的原漢族群互動記憶〉，收於羅烈師主編，《Qmul rhzyal Tayal？開山打林？逆寫北臺灣客庄形成史》（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頁 111。

置；漢人則是被想像與建構出來的被害者。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當地方漢人記憶多以「開墾」或「防番」等內山開發史觀來建構其歷史正當性時，泰雅族原住民的口述記憶之形塑，也可能對於漢人的開發史敘事構成挑戰。而原住民的記憶系統與生存倫理，則有機會反向揭示出一種歷史觀的差異。在許多原住民耆老的口述中，祖先並非「等待被開發」的他者，而是主動抵制漢人侵略、守護山林、遵循傳統規律、與土地維持靈性關係的主體行動者。相較於漢人口述記憶中的開發史敘事，原住民族記憶則往往指了這些漢人山林開發行動所造成的禁忌、破壞與環境失序。這不只是對歷史的另一種詮釋，更構成了一種倫理與知識論上的反向批判。漢人的開發史觀強調土地的利用與資源的最大化，將原住民族視為未開化、阻礙墾殖化進程的他者；但原住民族觀點卻指出，此種歷史觀本身正內含著一種暴力——不僅是身體與土地的暴力，更是對文化秩序與知識系統的否定與排除。因此，若要理解地方口述歷史的多重層次，不能僅止於重建漢人群體的墾殖敘事，更應將原住民族的記憶作為一種具批判性的位置來審視——這不僅有助於平衡原漢互動的複雜面貌，也能鬆動以「開發」為中心的歷史敘事架構，進而思考在「解殖」墾殖型殖民的語境中，記憶與歷史的政治如何重構部落認同與土地倫理。

另一方面，由於殖民歷史、文化與經濟衝突等因素，一些原住民耆老對漢人互動的歷史記憶，可能持有懷疑、不信任或對立的態度，並且視漢人為部落傳統獵場的侵略者，對族人的土地和文化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但從當代桃園、新竹地區的道卡斯與凱達格蘭平埔族的耆老記憶與敘事角度中，並沒有從漢人的角度敘述內山地區的開墾歷史，而是強調自身家族在開發歷史中的重要位置（例如，竹塹社與霄裡社後代家族），敘述與泰雅族互動與衝突的記憶時，隱含著一種文明進步論的思維，將「熟番」與「生番」進行當代的解釋與位階的區分，暗示我族（平埔族群）是比泰雅族還文明的族類，認為「生番」是「生生的」判斷，進而區辨出「較文明／非文明」的認知；而在當代泰雅耆老對於平埔族的記述中，

沒有強勢侵逼說，並沒有「平埔族一直進入山區」此種侵逼意味的用詞，也會區別出漢人與平埔族的不同。⁷⁵換言之，泰雅耆老並未將平埔族視為侵略者，並能和漢人有所區別，呈現出差異於「原、漢合作對抗泰雅族」的歷史敘事。

當我們反思這類地方開發記憶及敘事時，同時又必須注意，是否在進行回顧與再現族群關係時，經常不察而落入「以今論古」的可能誤差。甚至忽略了族群或種族經常是建構出來的。⁷⁶例如，時常出現的「殺人」或「砍人頭」等用詞，我們須注意到，評價該行為是否為「殺人」，需要考慮當時的歷史背景、社會條件、文化習俗和彼此之間相互作用的關係。應該將其放在歷史和社會的背景下進行分析，以便理解當時的情境和動機。假若這類地方地記憶與碑文，僅在名義上把「番／蕃」改成「原住民族」，實質上並未改變史觀。⁷⁷因此，重要的仍是從敘事角度與敘事邏輯層面，進行雙方對等的換位思考。例如，傳統文獻裡的「內山」一詞，隱含從平地望向山區的開發方向性。若從原民族傳統領域的地理知識來看，實際上多數為族人的傳統獵場及生存領域，應是與「番界」一樣需要標註說明的詞。因為這類空間概念皆隱含著將原住民土地視為無主地，進而能夠前拓墾之想像。換言之，目前原住民族這端的人群互動記憶，和漢人開發史觀底下的諸種記憶及敘事類型皆有差異。甚至面對漢人主流社會所建構的敘事，呈現出不同的歷史面向。如果漢人開發史觀是「墾殖殖民主義」的一種面貌，那麼原住民族這端的多元記憶，則提出另一種記憶與敘述原漢互動歷史的視角，甚至是未來需要重塑一種「互為主體」之歷史觀的必要參照。

雖然，歷史上漢人和原住民族之間發生過各種衝突和暴力事件，不僅是原住民群體，特定漢人家族也可能成為這些事件裡的歷史受害者，因而形成複雜而多

⁷⁵ 梁廷毓，〈桃園、新竹沿山地區平埔、泰雅與客家族群互動記憶〉，《桃園文獻》第 12 期(2021.09)，頁 87-88。

⁷⁶ 劉瑞超、張維安、劉堉珊，〈臺三線客家帶原客關係的再探與重構〉，收於蕭新煌、張翰璧主編，《臺馬客家帶的族群關係：和諧、區隔、緊張與衝突》(臺北：遠流，2022)，頁 234-235。

⁷⁷ 羅烈師、陳龍田，〈北臺灣原客鄉鎮志的原住民族書寫分析與建議〉，收於羅烈師主編，《Qmul rhzyal Tayal？開山打林？逆寫北臺灣客庄形成史》(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09)，頁 43。

樣的地方敘事。但是，我們需要意識到「墾殖者社會」底下的主流漢人開發史敘事，造成社會普遍對原住民族帶來的長期刻板印象之影響和偏差心理，並且隱含將原住民群體在歷史中經歷的種種現實——包括土地剝奪、文化毀壞、種族歧視和社會排斥等不公正待遇——藉由開發過程來合理化的言說邏輯，甚至為開發造成的侵逼行為提供正當化的說詞。更重要的是，這些地方記憶和敘事，可能對原住民族的生活、文化和社會造成持續性的影響，並且在當今社會仍然存在。因此，漢人這端可能確實曾遭受過傷害事件，但不應混淆或抹消「墾殖型殖民」所帶來的結構性偏見與單一敘事。唯有透過對這類歷史遺產的理解和教育，甚而開啟當代漢人聚落和部落之間的對話和溝通，才有可能拆解長久深植於沿山地方社會的開發史觀。

五、暫結語

本文首先回顧漢人開發史觀底下的地方記憶、碑文與地誌，指出這一套地方社會裡普遍出現的「漢人開發史」敘事底下，當代地方居民及開墾者後裔們，似乎同樣藉由一系列被「侵害」、「侵入」與「騷擾」的論述，來區分敵我之間的關係。雖然，記憶的傳述無法直接作為歷史事實或證據，但仍然使我們望見當代地方社會對於歷史的想像及認知。透過對這些敘事的分析，本文揭示了族群記憶和歷史觀，如何受到「墾殖型殖民」的影響及形塑。更重要的是，也能看到漢人開發、墾殖過程建構的開發史觀與土地觀念，仍反映出「墾殖者社會」的面貌。諸種記憶的敘事內容及類型，包含「番害」；「食番肉」；「番仔相殺」與「討番妹」等記憶，皆隱含漢人開發史觀的敘述邏輯，甚至轉化成具備教育或威嚇孩童目的，或是具道德教化意味的敘事。

首先，「受害者—加害者敘事」中，漢人自我定位為受害者，強調遭遇原住民「出草」與「砍頭」的經驗，並以此合理化報復行為，進而將原住民非人化與他者化，掩蓋漢人拓墾過程中的暴力歷史。其次，「原漢合作型敘事」描繪漢人

與平埔族的共同開墾，卻以「番仔相殺」將泰雅族的暴力行動與平埔族對立起來，漢人自居為旁觀者，實則再現不對等的合作關係與「漢化=文明化」的殖民論述。第三，「通婚的功利型敘事」將漢番通婚視為避免衝突的策略，語言中流露貶抑意味，顯示原住民女性在社會階序中仍被物化與他者化。第四，「恐嚇教化型敘事」利用「番仔會殺人」作為管教工具，將歷史暴力經驗轉化為代代流傳的社會規訓語言，加深原住民作為危險他者的形象。第五，「道德與文明化敘事」則認為「番仔只殺壞人」，透過道德判斷來詮釋歷史暴力，重申漢人文化優越與原住民的「可教化性」。最後，「逆轉型敘事」則來自少數具有反思意識的漢人觀點，試圖挑戰原漢二元分類，指出侵佔土地的漢人才是真正的侵略者，並揭示族群記憶中潛藏的權力結構與歷史責任。這些敘事不僅形塑族群關係，也反映了不同世代與社會位置對歷史與他者的理解差異，呈現出多種敘事型態，反映出不同時期、立場和觀點，對原漢族群關係的理解與詮釋。

接著，本文進一步以「墾殖型殖民」的批判視野，反思相關的記憶及敘事。便可以清楚理解，隨著漢人開發土地的進程，原住民的生活和文化環境也發生了變化。開發活動為漢人帶來新的政治、經濟機會，但同時也對原住民的土地權利、山林環境和文化傳承帶來壓力和破壞。在此意義下，一些漢人移民或定居至原住民生存的空間，並對當地資源和土地進行開發和利用，便是一種殖民行為。而在主流的漢人「內山開發史觀」底下，既忽略了漢人在開發過程中對原住民的掠奪、壓迫和文化摧毀，亦忽視了原住民族的土地權益和被侵逼歷史。換言之，墾殖型殖民和歷史敘事、地方記憶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此種關係涉及權力、身份、歷史和文化的衝突，並持續影響著當地的社會和文化動態。

具體而言，漢人這端的「內山開發史觀」與「墾殖型殖民」的關係，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歷史權力建構：(1) 將墾殖視為「開拓」而非殖民，強調漢人的辛勞，而忽略原住民族的土地權。著重描述「荒地」的開發，忽略這些土地原本的使用者（原住民）。強調祖先的辛勞（築田、修水圳、開山伐木），以「勇敢對抗險惡環境」來合理化拓墾，將困難歸因於自然（野獸、沼澤）而非社會因素（原

住民的抵抗)。(2)去原住民化的歷史建構，將原住民描繪為「外族」，透過故事來鞏固對土地的正當性。妖魔化原住民「獵首」為一般的「殺人」，將原住民族的反抗視為不理性的暴力行為，而非對土地掠奪的正當性抵抗。且原住民族經常被描述為「敵對者」、「外來的威脅」，暗示原住民是「在外圍」的群體，而非土地的原居者。(3)往往以家族史為核心，淡化漢人墾殖的集體性與政策性的力量。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漢人的口述歷史往往聚焦於開墾、與自然環境奮鬥、對抗「生番」或野獸等經歷，將移墾視為艱辛的「開發」。此種敘事強調漢人如何「從無到有」建立家園，卻往往忽略了這一過程伴隨的原住民族土地掠奪與衝突。因此，這些敘事往往忽略墾殖者並非單打獨鬥，而是透過宗族組織與官方合作等制度性力量進行土地掠奪。使拓墾的政治與經濟結構淡化、消失於歷史敘事中，彷彿單純只是人與環境的搏鬥，而非相對有系統性的殖民行為。

儘管本文引用的討論文獻中，參照不少筆者既往的研究成果，並且和《噤聲之界：北臺灣客庄與原民的百年纏結和對話》(2024)一書在思考主題、方法與觀點上有高度的關聯性，包含對墾殖型殖民主義的反思、墾殖史中的原漢邊界之形構、「侵擾／受害」意識的建構與重新評估等。⁷⁸然而，本文所採取的研究取徑，在理論架構與敘事分析上，對《噤聲之界》形成具體的推進之處，主要在於以「敘事類型」作為主要探討對象，並且細緻化漢人墾殖者之記憶形塑機制的理論性探討。透過上述六種敘事類型的歸納，本文企圖呈顯漢人如何在記憶與口述歷史的形塑當中，反覆構築原漢邊界的敘事框架，並反映出不同層次的權力問題。此一分類與分析不僅差異於《噤聲之界》中較偏重田野札記、抒情敘述與文本揉合的撰寫形式，也進一步突顯口述資料在理解墾殖型殖民研究中的可能價值。

更重要的是，當前關於「墾殖型殖民」的批判性研究，多數聚焦於權力結構的宏觀治理機制與政治經濟背景，強調國家機器如何透過軍事鎮壓、行政劃界與土地制度等手段實施殖民控制。這些研究普遍著重於官方文件與法律制度的分

⁷⁸ 參見梁廷毓，《噤聲之界：北臺灣客庄與原民的百年纏結和對話》(臺北：游擊文化，2024)。

析，並從結構性角度呈現漢人與原住民的矛盾衝突，將其置於殖民體制的框架中理解。另一方面，關於地方原漢族群互動的記憶研究，則鮮少將其置入墾殖型殖民的批判論述中加以探討，這造成了研究視角的某種斷裂與不足。因此，本文企圖透過口述歷史的方法切入地方漢人的日常記憶與敘事實踐，從微觀層次揭示了漢人社群如何在墾殖敘事當中建構其正當性，並且透過「食番肉」等特殊的敘事，展現出一種漢人地方社會特有的暴力認知與倫理觀。同時亦結合了敘事分析與社會記憶理論，強調時間重疊下的口述記憶的多重層次與流動性，深化了對原漢互動敘事的生產機制之理解。相較於既有研究多聚焦於制度與政策層面，本文透過不同敘事類型的分析，以桃園、新竹地區為案例，補足了「墾殖型殖民」批判中對地方經驗與記憶實踐的理解，提出在殖民治理框架之外，民間的口述記憶如何形塑歷史想像與族群關係的差異視角。

最後，本文認為應當擺脫傳統以「拓墾」、「設隘」與「防番」為核心的漢人開發史觀點，轉向批判性地理解墾殖型殖民與原漢關係。同時，過去在北臺灣「內山」從事底層勞作的漢人群體（如腦丁、隘丁與佃人）也未必擁有書寫能力，因此對於口述歷史的蒐集與分析顯得格外重要。透過口述歷史的交叉比對和探討，不僅能揭示墾殖型殖民如何在不同層面影響原漢之間的關係，更可能挑戰以「拓墾」來正當化土地掠奪作為的歷史論述。我們也須注意，墾殖型殖民」理論的援用，雖然有助於本文對歷史敘事結構的理解，但在面對不同區域與地方社會的尺度時，可能也有其分析上的限制和不足，未來仍值得進一步細緻地探討。更重要的是，也需要對於「形塑記憶」背後之認知機制或歷程，進行更深化的描述和討論。當我們談論漢人內山開發史時，不能忽視原住民於該區域裡的角色。重點也許並非要徹底否定漢人開發史觀，藉以重新豎立以原住民經驗和視角為中心的歷史敘述。而是通過反思、修正和多元化的來建構雙向及對等的地方敘事，推動地方社會中跨族群之間記憶的相互形塑之文化工程。

引用書目

外文專書

- Abrams, Lynn. *Oral History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16) .
- Pennebaker, James et al. (eds.) *Collective Memory of political Events: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7) .
- Shepherd, John R. *Taiwan bianjiang de zhili yu zhengzhi jingji* (yiliu linglingyiba lingling)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 1800], 2 vols. Trans. Lin Wei-cheng et al.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6) .
- Teng, Emma Jinhua.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
- Veracini, Lorenzo. *The Settler Colonial Pres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 Wolfe, Patrick.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thropology: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an Ethnographic Event* (London: Cassell, 1999) .

外文專書論文

- Pennebaker, James & Banasik, Becky L. "On 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ollective memories: History as social psychology." In James Pennebaker, Darío Paez, & Bernard Rimé (eds.) ,*Collective memory of political events: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7) , pp. 3-19.
- Portelli, Alessandro. "What Makes Oral History Different?" In:*The Oral History Reader*, (eds.)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 pp. 63-74.

外文論文

- Wolfe, Patrick.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Elimination of the Nativ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8, no. 4 (2006) , pp. 387-409.

中文專書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冊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員工福利委員會，1972）。
-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717）。
- 周錦宏主編，《客家先賢淡水同知李慎彝與內山開發研討會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1993）。
- 張維安主編，《客家與周邊族群關係》（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
-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陳盛韶，《問俗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 梁廷毓，《噤聲之界：北臺灣客庄與原民的百年纏結和對話》（臺北：游擊文化，2024）。
- 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楊雅婷譯，《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
-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 黃卓權,《苗栗內山開發之研究》(苗栗:苗栗縣文化局,1990)。
- 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1)。
- 謝維修,《龍山翠微——大溪鎮龍山寺沿革誌》(桃園:大溪鎮龍山寺,2005)。
- 簡祺偉,〈三層福安宮與來臺媽祖沿革簡介〉,收於《大溪福安宮圓醮慶典特刊》(桃園:三層福安宮,2002)。
- 廖明進,《草嶺山的鬼火》(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2005)。
- 廖明進,《我的家在八結》(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2007)。
- 羅慶武,《關西人文誌》(新竹:未刊行,1989)。
- 潘振鏞,《高原社區拓展史》(桃園:高原社區發展協會,2001)。
-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劉名揚,《客家大埔劉派(劉承豪)與新竹內山之開發》(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研究報告,2003)。
- 藍鼎元,《平臺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關西鎮鄉土文化協會,《牛欄河畔》(新竹:關西鎮鄉土文化協會,2021)。
- 蕭新煌、張翰璧主編,《臺馬客家帶的族群關係:和諧、區隔、緊張與衝突》(臺北:遠流,2022)。

專書論文

- 王世慶,〈臺灣隘制考〉,收入王世慶編,《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1984),頁 373-414。
- 陳龍田,〈北臺灣原客關係相關公開文字資料蒐集介紹與分析〉,收於羅烈師主編,《Qmul rhzyal Tayal? 開山打林? 逆寫北臺灣客庄形成史》(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頁 71-72。
- 梁廷毓,〈桃園、新竹沿山地區泰雅部落的原漢族群互動記憶〉,收於羅烈師主編,《Qmul rhzyal Tayal? 開山打林? 逆寫北臺灣客庄形成史》(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頁 78-119。
- 施正鋒,〈原住民族的歷史重建〉,收於施正鋒、許世楷、布興·大立主編,《從和解到自治:臺灣原住民歷史重建》(臺北:前衛,2002),頁 305-332。
- 黃卓權,〈清代桃竹苗地區內山開發史的族群關係〉,《客家先賢淡水同知李慎彝與內山開發研討會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政府文化局,2003),頁 149-172。
- 羅烈師、陳龍田,〈北臺灣原客鄉鎮志的原住民族書寫分析與建議〉,收於羅烈師主編,《Qmul rhzyal Tayal? 開山打林? 逆寫北臺灣客庄形成史》(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頁 42-43。
- 劉瑞超、張維安、劉堉珊,〈臺三線客家帶原客關係的再探與重構〉,收於蕭新煌、張翰璧主編,《臺馬客家帶的族群關係:和諧、區隔、緊張與衝突》(臺北:遠流,2022),頁 234-235。

學位論文

- 呂佩如,《清代竹塹內山地區的拓墾:以合興庄為主軸的探討(1820-1895)》(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9)。

期刊論文

- 施添福,〈清代臺灣北部內山的地域社會及其地域化:以苗栗內山的雞隆溪流域為例〉,《臺灣文獻》第 56 卷第 3 期(2005.09),頁 182-242。

- 施添福，〈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一）：以罩蘭埔為例〉，《臺灣文獻》第 55 卷第 4 期（2004.12），頁 143-209。
- 梁廷毓，〈龍潭、關西地區的「番害」記憶之口述調查〉，《臺灣風物》第 70 期第 2 卷（2020.06），頁 157-183。
- 梁廷毓，〈桃園龍潭近山地區耆老的原客族群互動記憶〉，《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14 期（2017.11），頁 125-138。
- 梁廷毓，〈桃園、新竹沿山地區平埔、泰雅與客家族群互動記憶〉，《桃園文獻》第 12 期（2021.09），頁 87-90。
- 梁廷毓，〈桃園、新竹地區的原客族群互動與伯公信仰傳說〉，《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21 期（2021.05），頁 59-60。
- 梁廷毓，〈桃園、新竹地區原漢族群互動下的孤魂信仰與鬼魅傳說〉，《臺灣文獻》第 73 卷第 4 期（2022.12），頁 347-348。
- 梁廷毓，〈桃園、新竹沿山地區的原漢通婚與收養記憶〉，《臺灣文獻》第 75 卷第 2 期（2024.06），頁 163-205。
- 梁廷毓，〈桃園、新竹地區「食番肉」記憶之初探〉，《興大歷史學報》（2023.06），頁 133-169。
- 詹閔旭，〈重構原漢關係：臺灣文學裏原住民族、漢人移民與殖民者的跨種族接觸〉，《中山人文學報》第 48 期（2020.01），頁 73-95。
- 黃卓權，〈臺灣內山開發中的客家人〉，《歷史月刊》第 134 期（1999.03），頁 66-71。
- 黃卓權，〈從版圖之外到納入版圖：清代臺灣北部內山開墾史的族群關係〉，《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 3 卷第 3 期（2013.09），頁 157-186。
- 楊朝傑，〈沿山地區聚落與族群學術研討會〉，《原教界》第 31 期（2010.02），頁 92-93。
- 蔡林縉，〈新南方論述《邦查女孩》與定居殖民批判〉，《中山人文學報》第 51 期（2021.07），頁 73-95。
- 羅烈師，〈沒頭祖公：羅華西魂斷下橫坑之謎（1806-1821）〉，《新竹文獻》第 67 期（2017.09），頁 24-31。
- 蕭阿勤，〈「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臺灣史研究》第 6 卷第 2 期（2000.10），頁 77-138。

網路資料

- 李金賢，〈浪漫臺三線：你們的篳路藍縷，是我們的顛沛流離〉，（來源：《今周刊》，<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54685/post/201812>，瀏覽日期：2025.02.16）。
- 王商益，〈臺三線上真有「三條線」，還一點都不浪漫！歷史上的「臺三線」如何成為原住民的血淚痕跡？〉，（來源：《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0810>，瀏覽日期：2025.02.16）。
- 詹美華，〈記憶的政治：集體記憶和集體遺忘〉，（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第 48 期，https://epaper.naer.edu.tw/edm.php?grp_no=3&edm_no=48&content，瀏覽日期：2025.02.16）。

其他資料

不著撰人，《淡新檔案》第 14304 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1867），無頁碼。

三角林三元宮，《三角林三元宮沿革》（桃園：三角林三元宮，1972），無頁碼。
上三墩廣靈宮，《上三墩廣靈宮沿革》（新竹：上三墩廣靈宮，年代未詳），無頁碼。

石門萬聖堂，《石門萬聖堂沿革》（桃園：石門萬聖堂，1988），無頁碼。

內灣廣濟宮，《內灣廣濟宮沿革》（新竹：內灣廣濟宮，1982），無頁碼。

田寮國王宮，《田寮國王宮沿革》（新竹：田寮國王宮，1987），無頁碼。

老社寮三和宮重建委員會，《老社寮三和宮沿革》（新竹：老社寮三和宮，1998），無頁碼。

燥坑永和宮，《燥坑永和宮沿革》（新竹：燥坑永和宮，1985），無頁碼。

筆者訪談，張姓耆老口述，時間：2018.07.14；地點：新竹關西馬武督部落。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張姓耆老稱之。

筆者訪談，周姓耆老口述，時間：2019.02.10；地點：新竹關西馬武督部落。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周姓耆老稱之。

筆者訪談，彭姓耆老口述，時間：2019.05.03；地點：新竹關西戈尤浪部落。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彭姓耆老稱之。

筆者訪談，蕭昌衡耆老口述，時間：2017.06.21；地點：桃園龍潭銅鑼圈大庄聚落。

筆者訪談，范振雲耆老口述，時間：2019.07.18；地點：新竹關西玉山聚落。

筆者訪談，吳姓耆老口述，時間：2020.01.09；地點：新竹橫山油羅聚落。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吳姓耆老稱之。

筆者訪談，葉仁貴姓耆老口述，時間：2017.08.10；地點：桃園龍潭黃泥塘聚落。

筆者訪談，李姓耆老口述，時間：2019.02.15；地點：桃園大溪田心仔聚落。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李姓耆老稱之。

筆者訪談，張姓耆老口述，時間：2020.03.20；地點：桃園龍潭大坪聚落。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張姓耆老稱之。

筆者訪談，王瓊珠耆老口述，時間：2023.11.25；地點：新竹關西湖肚聚落。

筆者訪談，范姓耆老口述，時間：2022.07.16；地點：新竹關西玉山聚落。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范姓耆老稱之。

筆者訪談，陳姓耆老口述，時間：2018.05.02；地點：新竹關西大竹坑聚落。受訪者要求匿名，故以陳姓耆老稱之。